

写点不一样的东西

“我，也离开了家。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，那种孤独漂泊的感觉。”——张彤禾

如果不去东莞，如果不是遇到伍春明和吕清敏，张彤禾一定会跟大多数人一样有相同的认识：打工者的生活跟一些媒体报道的一样，充满了枯燥、乏味、重复、高强度。他们长时间加班，彼此间缺乏沟通交流，挣扎在社会底层。

“一些外媒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，工人们所得了了。”张彤禾说，“我怀疑事情不致于此。”

这个祖籍吉林的华裔女性，对这个群体有着本能的关注，不仅因为其家族的多次迁徙，也因为作为驻外记者的长期奔波。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，原来我跟我写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。”张彤禾在书中写道：“我，也离开了家。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，那种孤独漂泊的感觉。”

2004年初，张彤禾决定到东莞这个加工产业密集的地方一探究竟，这一探就是两年。

东莞“是有关中国一个极端反常的表达”，这个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城市里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。

她花大量时间在东莞的工厂里采访；她游走在地下卡拉OK夜总会，有些女工在那里卖笑；她甚至跟女工们去“交友俱乐部”，在那里她看到了“八分钟约会”，还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书中主角的伍春明。

经过初期的采访，张彤禾就发现了与“血汗工厂”之类的报道不同的东西。在刊发了几篇报道、与几位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孩深入交流后，“我都可以写本书了”，张彤禾感觉到。

彼得·海斯勒（中文名何伟），《寻路中国》的作者，也是张彤禾的丈夫鼓励她实现这个想法。“我决定写点不一样的东西”，张彤禾说。

2013年4月9日，张彤禾回到北京，带着刚刚在内地出版的《打工女孩》。晚7时许，张彤禾与读者坐到一起，分享在东莞的两年时间里，自己眼中的流水线工人生活。

每人都有过人之处

“吕清敏兼顾勇气和韧性，伍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。”——张彤禾

2004年的秋天，还是一个周日的下午，在东莞做建材销售的伍春明，走进东莞交友俱乐部，她想在这里找到一个心仪的伴侣。“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，多给自己一些机会。”身着黄绿色毛衣、白色牛仔褲的她站起来发言。

从开始在一家玩具厂的流水线上工作，一路走到销售员的职位，伍春明“一心都扑在了工作上”，无暇认真地经营一段感情。这一年，她29岁了，“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事，所以我来了。”

张彤禾在这里遇到伍春明时，这个29岁的女孩在外打工已经有12个年头了。

这年2月一个周日的下午，辞去佳荣电子制品厂流水线工

4月9日晚，张彤禾带着《打工女孩》一书的简体中文版，来到北京单向街书店，与读者交流。图为《打工女孩》封面。（资料片）



《打工女孩》作者张彤禾

另一种真实

——倾听东莞打工者的个性声音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

当提及工作在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，你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血汗工厂、单调重复？抑或是绝望的纵身一跃？

莱斯利·张（中文名张彤禾）的笔下却有另一面真实。

“更年轻的一代”、“农村里的精英”、“受过较好的教育”、“更上进”，张彤禾在到东莞之前，曾给自己的采访拟定了这样的范围。正是在这个范围中，张彤禾才得以走进吕清敏和伍春明的生活。

十年的中国生活，两年的东莞采访，在张彤禾的笔下，《打工女孩》一书中的这两位主人公，年轻、勇敢、积极，塑造着新的自我，追求着更好的生活。

的吕清敏，第一次走进东莞的人才市场，她要找一份办公室文员的工作。“放低目标”，她对自己说。奕东电子公司的经理李朋杰，录取了这个没有该岗位从业经验，但书法好、诚实的女孩。

“更年轻的一代”、“农村里的精英”、“受过较好的教育”、“更上进”，张彤禾在到东莞之前，曾给自己的采访拟定了这样的范围。正是在这个范围中，张彤禾才得以走进吕清敏和伍春明的生活。

今年4月初，吕清敏告诉张彤禾，她已经结婚，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。在丈夫的老家照顾了几年孩子之后，她再一次走出农村，并且在贵州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。“每个月差不多赚4000块，挺好的。”张彤禾听到吕清敏的消息

非常高兴。

“春明还在东莞，还在生活，还在发展。”张彤禾说，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9年多，她仍和书中的两位主人公保持联系。她们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生活全然没有交集。

“她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过人之处”，张彤禾说。

对成功近似疯狂的追求

“您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要跳厂了，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，再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，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……”——伍春明

伍春明追求幸福和生命意义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，这个17岁就离家打工的姑娘，开始打工时的经历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在父母眼中，伍春明不是个安分的孩子。1992年夏天，伍春明第一次出去并没有告诉父母。她和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姐，借钱买火车票到东莞。“我要在广东闯出一番天地来……我的计划是：第一，去读函授大学；第二，学会讲广东话；第三，一无所有，一事无成，决不结婚。”

虽然经历了初次打工的不适、父母激烈的反对，伍春明还是决定出去。回到老家休整半年后，1993年春天，她坚决地再次来到东莞，并和邻村的朋友一

起，被国通玩具厂录用，每月工资100元。

显然，每个月一两百元的薪水无法满足她。短短一年内，伍春明辗转几家工厂后，进入了一家名为“银辉”的玩具工厂。正是从“银辉”起步，伍春明迎来了转机。得知工厂内部招聘文员，伍春明主动请缨，阴差阳错，伍春明竟然如愿以偿。

1994年5月25日，“想来想去，来到广东跳了四五个工厂，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”，伍春明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。

“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也不会明白女儿心里真正所想的”，在另外一篇日记中，她把一些对父母说的心里话写在纸上，“您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要跳厂了，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，再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，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……”

第二次来到东莞后的头三年，伍春明没有回过一次家。“放假时间太短”只是她的借口，“最主要的原因，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。因为，我要读书！”

伍春明读书的愿望十分迫切。“差不多一点了吧！看到这本《外来工》舍不得放手，但晚上七点又要上班……我真恨时间实在是太多了……还剩下多少时间来看书，这样上夜班时间总是零零碎碎的”，她甚至抱怨工作挤占了看书的时间。

读小说，练书法，学说广东话，“唉，我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，时间又太少了”，在日记中，伍春明不断提醒着自己，“时间就是生命。”每当发现自己懈怠之时，她甚至会日记中责骂自己。

对伍春明来说，广东话是重要的，因为在她眼中，这是各工厂领导层日常交流使用的语言，而她终于在1995年学会了。这一年，她跳槽到一家做水枪的工厂，升

职到总务部门主任，工资涨到了每月800元。

张彤禾在书中写道，“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”伍春明开始研究工厂高层的一举一动，在日记中记下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，学习领导力、化妆和英语。她的目标，是一个“自信、练达、端庄、优雅”的职业女性。

对成功近似疯狂的追求，把伍春明推向了险境。1996年，她加入了传销。虽然月收入最高时可达4万元，但两年后政府对传销组织的打击，让她走向失业。

直到2005年伍春明第二次创业，都没有放弃学习英语的念头，她甚至在创业初期离职，专心学习英语。这让张彤禾非常高兴，可事实的走向颇具戏剧性，伍春明最终放弃，加入了直销的阵营。

在东莞采访的两年时间里，张彤禾笔下的另一名主人公——吕清敏，也从办公室文员成长为一个采购员。她已经能更自如地处理各种关系，让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
时间的紧迫感和对成功的渴求，是让书中这两个主角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张彤禾发现的，是关于打工者的另一种真实。

不论是伍春明还是吕清敏，当她们转身融入到东莞庞大的打工队伍，仍不得不面对稀缺的资源、有限的上升通道，以及因缺少真心朋友而带来的孤独感。

“我和她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”

“她们，比起其他任何一切，都更能代表当下的中国：一个正挥别乡土和动荡过去，并拥抱光明但又忐忑未来的国度。”——《时代周刊》书评

总有人能在她们身上找到一些熟悉的东西。

“读这本书，给我最大的感觉是，其实我和她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”在北京工作的一个白领这样说，“虽然我是在城市成长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，但是我所生活的环境，稀缺的资源告诉我，还是要靠自己。”

有意或无意，读者都在找寻自己的影子。“从农村出来，一路读到研究生，然后找到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，在一个城市里立足，我和她们多像啊！”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张涛说。

“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”，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打出的标语。

在接触过许许多多的“打工女孩”后，张彤禾选择了这二人。“她们的背景很典型，都是从普通的农民家庭走出，但她们都很有个性，这方面不是最典型的。”张彤禾说。

而这，也成为不少读者质疑该书的原因：张彤禾的选择，具有倾向性。确实，连张彤禾也承认，她所描写的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，而是更年轻一代。

“他们出来是为了留下，是为了追求城市里的机会，他们的生活变动，代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。”出版社在推广此书时说。

在结束了TED的演讲后，主持人问张彤禾，如果你有一分钟时间，会对Apple制造商的领导人说什么？

“如果你们想要帮助那些工人，开展一些小型、集中、基础的课程，这会使得你的工人得到提升。希望他们也会晋升到Apple更高的职位中，你可以帮助他们适应社会流动性，帮助他们得到自我的提升，当你与工人们交谈，你就会知道，这就是他们所要的。”张彤禾这样回答。

